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德]费勃 Rafael Ferber ● 著

哲人的无知

Warum hat Platon die “ungeschriebene Lehre”
nicht geschrieben

王 师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哲人的无知

Warum hat Platon die “ungeschriebene Lehre”
nicht geschrieben

[德] 费勃 Rafael Ferber | 著

王 师 | 译

黄瑞成 | 校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人的无知 / (德) 费勃著; 王师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 4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书名原文: Warum hat Platon die “ungeschriebene Lehre” nicht geschrieben?

ISBN 978 - 7 - 5080 - 5646 - 3

I. ①哲… II ①费… ②王… III. ①柏拉图 (前 427 ~ 前 347)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8089 号

© Verlag C. H. Beck oHG, München 2007

Warum hat Platon die “ungeschriebene Lehre” nicht geschrieben?

Rafael Ferber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01 - 2009 - 0499

哲人的无知

[德] 费勃 著

王师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开

印 张: 6.75

字 数: 140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εάρι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Aldus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体例。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以及Erich Loewenthal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

2 哲人的无知

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九十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於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刘小枫 甘 阳

2005年元月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 (顾丽玲 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 (吴飞 译)
- 3 克力同 (罗晓颖 译)
- 4 斐多 (刘小枫 译)

卷二

- 1 克拉底鲁 (刘振 译)
- 2 泰阿泰德 (观溟 译)
- 3 智术师 (观溟 译)
- 4 治邦者 (张爽 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 (曹聪 译)
- 2 斐勒布 (李致远 译)
- 3 会饮 (刘小枫 译)
- 4 斐德若 (刘小枫 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 (梁中和 译)
- 2 希普帕库斯 (乔戈 译)
- 3 情敌 (吴明波 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 (刘振 译)
- 2 卡尔米德 (彭磊 译)
- 3 拉克斯 (黄旭东 译)
- 4 吕西斯 (黄群 译)

卷六

- 1 欧蒂德谟 (刘麒麟 译)
- 2 普罗塔戈拉 (刘小枫 译)
- 3 高尔吉亚 (李致远 译)
- 4 美诺 (郭振华 译)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 (王江涛 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 (王江涛 译)
- 3 伊翁 (王双洪 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 (魏朝勇 译)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 (张纆 译)
- 2 王制 (史毅仁 译)
- 3 蒂迈欧 (叶然 译)
- 4 克里提阿 (叶然 译)

卷九

- 1 米诺斯 (林志猛 译)
- 2 法义 (林志猛 译)
- 3 厄庇诺米斯 (程志敏 译)
- 4 书简 (彭磊 译)

杂篇 (刘锋 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中译本说明

柏拉图的所谓“未成文学说”是柏拉图研究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它指的是：除了流传下来的对话作品外，柏拉图还有未形成文字的学说。有别于外传的对话作品，未形成文字的学说是国内的、秘传的，仅仅口传。柏拉图研究学界本来早已基本认定，柏拉图并没有这种内传的未成文学说，但在上个世纪后半期，因德国图宾根大学和意大利米兰大学的几位古典语文学家（号称“图宾根学派”和“米兰学派”）坚持己见，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问题又一度引人关注。

本书作者是德语学界研究柏拉图的新秀，他坚守传统看法，针对图宾根大学和米兰大学的几位古典语文学家的“新成果”提出了新的辩驳，据说给了图宾根学派和米兰学派以毁灭性打击。凭靠这本差不多二十年前（1991）出版的小书，作者一举成名，在如今的柏拉图研究学界受人瞩目。本书初版由国际柏拉图学会印行，印制质量很差，流传想必也不会广，但《哲人的无知：何以柏拉图未写下“未成文学说”？》这个书名颇为招人眼目——像笔者这样的柏拉图学的外行，也被书名吸引，十年前买来一读，印象深刻。去年组译并购买版权时才得知，此书已经有了新版，而且是平装袖珍普及本，新添“补记”回答了初版引发的讨论，篇幅接近原书一半，可见已经引起柏拉图研究圈外更为广泛的读者的兴趣。虽然本书处理的是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这一相当专门的问题，却使得我们能迅速接近这一著名公案的前沿。事实上，本书涉及柏拉图作品的独特品质这一大问题，不仅对理解柏拉图的作品有帮助，对理解何谓“哲学”也不无裨益。

中译本仍然保留“哲人的无知”这个第一版用的正题。德文新版删掉正题、直接用副题做书名并非出于作者本意,而是德国出版社出于商业考虑的要求。事实上,“哲人的无知”才挑明了本书的关键:如果柏拉图有“未成文学说”,他就违背了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关于哲人“无知”(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学说”)这一根本看法。换言之,坚持柏拉图有“未成文学说”的学者,恰恰表明自己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心目中的哲人。

原书注释接近正文一半篇幅,大多很长(最长的达三页半),作者似乎想让非专业人士免看繁琐论证,仅读正文,但对我们来说,恰恰需要好好学习辨析的深入细致。因此,我们将大多长段注释挪到正文所在位置,便于阅读(原书注释为尾注,中译本改排脚注),也便于排印(凭编码[原书页码]查索原文的读者,请留意中译本与原书处理注释的差异)。

黄瑞成博士审校了全书,朱振宇、徐卫翔、肖恩惠帮忙翻译了注释中的多处长段意大利语引文,谨致谢忱!本书辨难细致绵密,翻译难度可想而知,舛误在所难免,盼方家不吝指正。

刘小枫

2009年10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中译本导言：灵魂的“密钥”

——柏拉图的“口传”与“书写”

徐 戡

鸟族长出羽毛而非毛发，是由尽管无害却又轻率的男人转变来的，他们本来专注于天象，却天真地相信，对此最可靠的明证来自视觉。

——柏拉图《蒂迈欧》(91d-91e)

据一位柏拉图研究大家的说法，“什么是哲学”这样的问题与“如何读柏拉图”的问题休戚相关。这话起码有悖于我们对哲学的惯常理解，让人不免糊涂起来：搞哲学是否一定要读柏拉图？读柏拉图为何必须考虑“如何读”的问题？无论如何，这话说得过于武断，很难让熟悉康德、黑格尔体系哲学的我们服气。大约二十年前，柏拉图学界新锐费勃(Rafael Ferber)做过一次学术报告，引发了一起关于柏拉图“未成文学说”旧案的纠纷。1991年，作者据这次报告整理成一部小书，题为《哲人的无知：何以柏拉图未写过“未成文学说”？》。如今，这本小书2007年增订版的中文译本终于面世，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有助于澄清前述困惑的契机。

费勃的论述在与图宾根学派的论战中展开，所讨论的内容紧紧围绕着柏拉图的写作性质问题。按照图宾根学派的想法，柏拉图在传世对话之外另有不传之秘。根据该派的考证，古典文献中不乏关于柏拉图秘传学说的隐踪，只有搞清楚柏拉图的“秘学”，才能破解柏拉图的真正秘密。该派认为，秘传学说实际上出自柏拉图的“口

传”，也就是说，其“本原学说”仅仅在学园内部讲授，并未公开刊行，因而又叫“未成文学说”。图宾根学派的一个基本主张是，“本原学说”独立于柏拉图对话，两者具有平行关系。柏拉图学的业内人士公认，恰切理解《斐德若》(273d2 - 279b3)中对书写的批判是审理这一问题的关键。费勃紧紧抓住这一纲领，分三个方面进行具体的探讨：首先，柏拉图既然对“书写”进行了批判，为什么仍然坚持写作？其次，柏拉图为什么采用对话体而非论述体？第三，柏拉图为什么没有将所有他在口传中看重的内容同样公开刊行？费勃的问题自然也是我们的困惑所在，尤其是当考虑到“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时，事情就越发复杂起来。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在于自知其无知——这等于在说，哲学究其本性不可能有某种现成的“学说”。倘若图宾根学派的说法成立，无异于在说柏拉图并非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哲人。柏拉图关于知识性质的论述散见于各篇对话，费勃对其中的主要论述进行了细致的辨析，重在阐明柏拉图为什么不可能写下所谓“未成文学说”。他对图宾根学派的主要论据逐一驳正，力图搭建各篇对话之间的一致性。

从柏拉图的写作生涯来看，他的确没有以苏格拉底不立文字的人生为榜样。柏拉图不但进行了大量构思缜密、文采斐然的写作，而且几乎全部是对话文体。同样从《斐德若》的书写批判出发，图宾根学派断定，柏拉图成文的对话在哲学论证上有所保留，“未成文学说”才是其真正的教诲。令人想不明白的是，“口传”的方式其实无法避免这种“秘学”被弟子记述下来——考究历史，确有学园的听课笔记刊印行世。费勃尖锐地指出，即便柏拉图真有所谓“秘学”，那么这种“未成文学说”同样是一种“书写”，《斐德若》中的书写批判对这样的“秘学”仍然适用。如果说，柏拉图从苏格拉底那里领略了真正的哲学，那么他必然会以一种特别的“书写”来传承这种真正的哲学。从众多反对声音同图宾根学派的论争来看，像我们这样的外行很难在困难重重的柏拉图迷宫中找到出路。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向柏拉图传统中的哲学前辈请教。

中古的柏拉图人法拉比讲过，柏拉图的方式不同于苏格拉底的方式——当然，含义与图宾根学派完全不同。搞清楚这两种说法的差异，对理解柏拉图意义重大。法拉比被誉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第二位导师”，他在解读《法义》时，一上来就讲到如何区分“内学”和“外学”的事情：

聪颖的柏拉图在向所有的人启发和揭引每一种知识时，并未感到自由。所以柏拉图采用了象征、谜语、晦涩和笨拙之类的成法，好让知识不会落入那些不配享有反而会知识变形的人手中，或者不会落入那些不识货或不会恰当运用的人手中。在这方面，柏拉图是对的。一旦柏拉图晓得并肯定自己已由这样的做法而变得有名，而且他随便想说什么都会通过象征来表达，也已在人群中广为流传，那么他有时就会直接转向他想讨论的问题，公开而又真实地和盘托出自己的看法。但任谁读了或听了他的讨论，都会假定他的说法是象征性的，而他的意图与他公开表达的东西大异其趣。这种观念就是柏拉图著作的秘密之一。此外，除非有人本身就对此道训练有素，否则就没人能懂得柏拉图公开表达的和以象征来阐述的东西，而且，如果对目下所说的这种训练不是很精通的话，那么也无法区分这两种东西。（程志敏译文）

法拉比等于是在说，柏拉图的文本有如一面灵魂的镜子，从中能鉴照出读者的天性差异。除非本身就是“训练有素”的读者，否则根本没有指望能读出“大异其趣”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沉思的生活方式与政治生活的诉求在目的上存在着深刻的异质性。对正确的生活方式的沉思绝不仅仅意味着质疑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必然会对所有的政治意见构成潜在的挑战。如果政治社会向来被“意见”所主导，而哲学又意味着超逾“意见”的艰辛努力，那么，真正的哲学就必须与现实政治保持审慎的距离（法拉比恰恰认为，服从习

传礼法对修习哲学是一种必要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之所以区分“外学”与“内学”,首先是出于区隔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需要。这种区隔体现在柏拉图的文本上就是对话式的论证方式,只有通过一种特别的眼力才能进入论证的纵深。倘若法拉比的说法成立,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说,要想探究柏拉图对话中的“什么”,决然离不开对话形式所呈现出来的“如何”。

阅读柏拉图的真正困境在于,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稟有古典的心性。身处启蒙之后的文化语境,古人能够了然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却存在着理解上极大的困难。其中,“内学”和“外学”的差异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就已经变得不可理喻。在施莱尔马赫看来,“内学”和“外学”的区分不过体现了修习阶段上的差异,并非由于人在天性上判然有别。这样一来,“内学”和“外学”之间的鸿沟就被抹平了。也就是说,实际存在的只是同一种柏拉图教诲,初学者和进阶者仅仅在理解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图宾根学派看似激烈反对施莱尔马赫,实则非但没有碰触到关键问题(参《王制》518c-e),反而将严肃对待戏剧形式这一柏拉图学的家法给搞丢了。其实,即便在启蒙时代,“外学”和“内学”的区分仍是学人圈子内的常识。早在1720年,遭到教会迫害的托兰德(John Toland)出版了一本文集,内含论文4篇,其中第2篇题为“掌管城门钥匙的人”(Clidophorus),仅从标题来看相当费解,幸好目录中的标题后面给出一段释文:

掌管城门钥匙的人;或关于显白的和隐微的哲学,亦即关于古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学说:前者乃开放的和公开的,顾及大众偏见和既有宗教;后者则为私人的和秘密的,教导剥去所有伪装的真正的真理,适于胜任的和分散的极少数人。

托兰德解释说,哲人必须懂得运用“双重教诲”:公开的教诲需要顾及“大众偏见”和“公认的习俗或宗教”,哲学的教诲则适于“万物的自然”乃至“真理”。哲人必须把通往真理的门“虚掩”上,而且

要采取“所有其他预防措施”，仅仅同“真诚、审慎和才智超群的朋友”交流。他明确指出，上述“外学”和“内学”实际上就是“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外学”与“内学”的区分乃基于人的天性高低，根本就是截然不同的教诲——至于如何看待这种目的的异质性，则恐怕与时代无关，而是取决于心性所向。在谈到柏拉图对话能够区分不同类型的读者时，托兰德所陈述的理由与法拉比的说法并无本质不同。两位哲人之所以能够穿越时代看到相同的事情，恐怕还是因为，哲学的性质本身并未随时代而改变。对古典哲人来说，单纯面向大众的写作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哲学。只要社会中存在着“少数人”和“多数人”的自然差异，古典式的写作原则就仍然恰如其分。法拉比和托兰德都是真正的哲人，在精研柏拉图笔法的同时，他们本身就在向古人学习书写技艺，并且自觉地传承审慎写作的古学传统。他们能够有如此眼力，乃是其古典心性使然。启蒙之后，区分“多数人”和“少数人”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我们如今可以通过重温经典来贴近这种古典的性情和教养。当然，在我们的时代流行着另外一种性情和教养，这些人不遗余力地把古典智慧拉低到自己眼界之内，不过证明了自己高度近视而已，我们实在不能指望这号人能够指点我们阅读古书。

费勃对图宾根学派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却仍让人觉得，他似乎并未真正超越对手的视域。对我们来说，如何恰切理解“书写”和“口传”之间差异的问题仍未完结。倘若我们不愿拾各类柏拉图主义之余唾，就有必要向柏拉图的真正传人学习，以便破译湮没已久的“柏拉图的方式”。在向法拉比这样的柏拉图人虚心求教之后，如下洞见就显得顺理成章：通过对话体的写作技艺，柏拉图避免了传统意义上的书写困境。简单说来，解决困难的钥匙就在于对话的书写方式——如果对话形式能够颠转惯常的论证方式，图宾根学派的“新解”就等于是无的放矢。这样一来，“口传”和“书写”的字面含义在更深的层次上就被颠转过来：所谓“未成文学说”并非一种看得见的“口传”（其实仍是一种变相的“书写”），而是一种看

不见的“书写”(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口传”)。

修习哲学之所以绕不过柏拉图,乃因为对话本身留下了破解苏格拉底身份之谜的“雅莉阿德涅线团”。要想把费勃的批判推进一步,必须首先还原柏拉图笔下所呈现出来的“苏格拉底问题”。根据《斐多》中的自述,苏格拉底同我们一样经历过哲学的修习阶段。在苏格拉底之前,不乏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哲学大师——熟悉海德格尔的读者都知道,返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是现代之后不少大哲的热切向往。然而,苏格拉底却对自己早年的哲学见识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在苏格拉底眼里,前人的哲学还算不得真正的哲学。换句话说,跟随海德格尔返回到哲学的“开端”,并不意味着触摸到了哲学的真正根基。苏格拉底讲得清楚,直接注视存在往往会使灵魂变得盲目,为了防止这种危险,他转而寻求“言辞中的庇护”——通过这一意蕴深远的转向,苏格拉底开始了“第二次远航”(《斐多》99d - e)。在苏格拉底看来,未经检省的人生是不值得去过的人生(《申辩》38a)。这话说得语重心长,实际上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受天性的驱使,自然哲人沉浸于忘我的静观之中。倘若未能检省这种生活是否好的生活,那么只能说明,这种生活不过恰好符合其天性而已,称不上是美且好的人生。因此,苏格拉底致力于追问什么才是好的生活,这就要求真正的哲人必须拥有自知之明。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必然呈现为遗忘自我(“美”)和关注自我(“好”)之间的爱欲辩证。柏拉图对话充满哲学和诗之间的张力,旨在通过苏格拉底来展示这种自觉的哲学人生。要想修习“真正的哲学”,就必须通过柏拉图的引领,在灵魂深处亲身经历苏格拉底的转向。图宾根学派对此置若罔闻,看来根本不懂何谓苏格拉底式的哲学。

回过头来可以问,托兰德这篇文章为什么以“掌管城门钥匙的人”为题?在论及柏拉图的时候,他所援引的文本恰好是《王制》。托兰德的意思很可能是,灵魂的等级秩序有如城邦的统治关系——这不禁让人想起《王制》中城邦同灵魂之间的关系。他似乎想告诉读者,“内学”和“外学”的区分实际上依赖于一种哲人的“诗术”。

通过这样的“诗术”，柏拉图一方面把“多数人”拒之门外，另一方面为“少数人”提供了登堂入室的钥匙。就此而言，托兰德的视域无疑与柏拉图的视域一脉相承。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对话就如同一种特殊的加密文本，只有透过情节的“密钥”才能还原柏拉图的深层论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情节乃戏剧的灵魂，必须由自身给出故事的“结”与“解”。显然，对话体并非柏拉图的独创，关键在于，对于真正高明的写作来说，“结”和“解”同属一体两面。图宾根学派以为对话之“解”在对话之外，无异于缘木求鱼，根本没能看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是用知识写在修习者灵魂中的言辞，实则一种“第二次远航”。归根结底，解密的过程乃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教育：通过关注对话的字里行间，有古典心性的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见证对话中的“突转”与“发现”——在哲学蒙尘的时代，这种困廓深远的教育肩负着正本清源的使命。为了透视柏拉图的谎言中的真实，有必要一再回到对话形式的表面——法拉比看到这一“柏拉图著作中的秘密”，无异于洞悉了柏拉图的“口传教诲”。法拉比带给后学的启发是，把握了对话的笔法，就仿佛接过了柏拉图亲传的“密钥”。在启示宗教侵入古典世界之后，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险恶处境。苏格拉底式的哲学之所以没有在历史厄运下绝迹，端赖于对话本身保存了柏拉图的口传微言。倘若指望图宾根学派姗姗来迟的所谓“发现”，柏拉图的衣钵只怕早已荡然无存。苏格拉底的名字唯一一次出现在标题中的对话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在这一点上与色诺芬并无不同），已然暗示了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差异所在。当哲学遭遇致命威胁的时候，“柏拉图的方式”总能引领为数不多的潜在哲人重建古典学园。当然，古人无法预见到今天的技术化大众社会，在全球化的尚同时代，悉心研读古书兴许是我们恢复哲学原初含义的唯一途径。

翻开政治哲学史，不难目睹这样的景象：古老而又巍峨的城门缓缓开启，获准步入城邦的古典心智薪火相承——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写给年轻的哲人，旨在“提供一把钥匙，用来打开紧锁的